

总第 9 期 **Total :Volume IX**

2011 年辑第 1 期 **Volume I 201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

Developments of Cliometrics Research in China

学术通讯 • 友情赠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China Centre for Cliometrics Studies GDUFS

广州 • 2011 年 1 月

January 2011 Guangzhou

目 录

- 1.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1952 年 以 来 中 国 经 济 态 势 初 探刘 巍 3

The ecocomic change from supply constraint to demand constraint——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 since 1952 Liu Wei

内容提要：一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还是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是研究其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是一切理论模型前提假设的上位前提，这关乎能否正确应用理论框架的大问题。首先应从总供求与价格的关系、贸易条件和马勒条件等角度对特定时空的经济态势做出相应的逻辑判断，然后再用计量方法证实这一判断，从而认定这一经济时空属供给约束型还是需求约束型。分析表明，到 1995 年，中国始终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之下，储蓄严重不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总供给；自 1996 年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储蓄大于投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总需求。

Abstract: to make certain of whether a country's economy is under supply constraint or demand constraint comes within applying a theory framework correctly and is the elementary premise to choose the hypothesis of a theoretical mode and study economical operation. Firstly, we should make corresponding logical decision of economic situation at special time base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ggregate supply and price、terms of trade and 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etc., then confirm the decision using econometric technique, thereby firmly believe it is supply constraint or demand constraint at this time. Analyses show Chinese economy is under supply constraint and deficient in savings until 1995 in morden times, and the key of economic growth lies in supply. Since 1996, Chinese economy is demand constraint, and the savings is above the investment, thus the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is aggregate demand.

- 2.英法德意四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基于 20 世纪 60~80 年代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陈 昭 12

Consumption'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France,Germany,and Ita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with the Model of Simultaneous Equatation from 1960 to 1980
Chen Zhao

内容提要：通过对英法德意四国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之规律分析，发现四国消费和经济增长近似同步变动，因为双方互为因果，双向正反馈，并且消费对经济增长之作用力呈现逐次降低态势，而经济增长对消费作用力则呈现“倒 V”形态。高消费高增长相伴而生，其基础条件是稳定而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产业就让百姓倾其所有的政策是不能使经济得到稳定而长期的发展，这是典型的舍本逐末，是经济发展的短视策略。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British,French,German and Italian consump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we can conclude that four countries` consumption is appropriate to economic growth in terms of causality of both sides which is positive. What`s more, the consumption`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s becoming progressively weak and the inverted V situation appears. High consumption attaches high growth on the basis of stabl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t is well kown that the industry can not get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if the policy can not benefit people,which is typically improper. The policy is the short-sighted strategy.

- 3.近代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考察（1887~1936）崔文生 21
Review of contemporary (1887~1936) China's money circulation velocity Cui Wensheng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交易方程式计算了中国 1887~1936 年 M1 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并对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影响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由于国内外白银比价变动导致的白银流入与流出。

Abstract: The paper attempts to calculate the income-velocity of money between 1887 and 1936 according to the equation of exchange and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velocity of the money circulation during the specified period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increasing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silver inflow and outflow generated by the 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 of silver at home and abroad.

4. 经济学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什么：计量经济史学的贡献

Jean-Luc Demeulemeester Claude Diebolt 秦庆 译 卢阳 校 28

How much could economics gain from history: the contribution of cliometrics

内容提要：计量经济史学是一门能够帮助经济学家缩短理论和实证分析之间差距的学科吗？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当然其中包括许多计量经济史学的倡导者，计量经济史学首先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技巧主要不是为经济学研究中有争论的部分而是为史学研究中的有争论部分提供解释。尽管如此，通过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发现真正的规律，这门学科能帮助经济学家更了解物理学吗？更准确地说，经济学家们最近所做的关于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表明，计量经济史学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不仅仅是历史学）。照此来说，计量经济史学应该成为所有获得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中的一部分。本文论述了关于经济学规律的存在性（和典型性）这一主要的方法论问题，以及从更好的为经济学发展服务的角度出发，论述应该给予计量经济史学适当的地位。

Abstract : Is cliometrics a discipline that could help economists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For many authors, and certainly many of its protagonists, cliometrics appears to be first of all a new branch of history, using economic theories,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provide answers mainly to 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and not so much to economic debates per se. Could nevertheless this discipline help economists to come closer to physics by enabling them to discover true laws in economics? More modestly some recent work in cliometrics performed by economists (*stricto sensu*)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of cliometrics to be an auxiliary discipline of economics (and not solely of history). As such, it should form part of the basic toolkit of all properly educated economists. In this paper we give a survey on the key methodological issue of existence (and type) of laws in economics and the proper role that could be assigned to cliometrics to best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in this perspective.

从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

——1952 年以来中国经济态势初探

刘 巍

内容提要：一国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还是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是研究其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是一切理论模型前提假设的上位前提，这关乎能否正确应用理论框架的大问题。首先应从总供求与价格的关系、贸易条件和马歇尔条件等角度对特定时空的经济态势做出相应的逻辑判断，然后再用计量方法证实这一判断，从而认定这一经济时空属供给约束型还是需求约束型。分析表明，到 1995 年，中国始终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之下，储蓄严重不足，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总供给；自 1996 年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储蓄大于投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总需求。

关键词：供给约束型 总供求 贸易条件 马歇尔—勒纳条件

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何时从供给约束型经济转变为需求约束型经济的，学界很少有人关注，在研究宏观经济具体问题一般也无人讨论这一“上位”前提。因此，在研究者错用理论框架分析经济时，也很少有人提出异议。考察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史，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经济运行都受制于或受益于某种不同的前提条件（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条件）。因此，在经济史研究中，首先必须弄清一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最主要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最主要的前提条件出发，才能建立正确的逻辑分析框架，这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必要条件。美国学者埃德温·查理（1990）认为，任何理论对于经济现实是否具有可用性，取决于这些理论所赖以存在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情况。如果所做假设与实际不一致，那么，依靠这种理论会把我们引入歧途。譬如，20 世纪初问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前提假设应该是“供给约束型经济”，即相对来说需求没有问题，只要资本形成增加、劳动力增加和生产效率提高（函数中的 A 值），就一定会有卖得出去的产品数量增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是在用数学语言表述着萨伊定律，因此，这一模型是无法解释需求约束型经济下的问题的，最典型的的就是大萧条。在美国大萧条中，为什么资本大量闲置？为什么失业率急剧上升？显然是因为需求一端出问题了，有效需求不足制约了经济增长，必须用需求约束型经济为前提的理论框架方能解释美国大萧条。同样，用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也无法解释供给约束型经济经济中的问题。譬如，为什么中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总是在控制集团购买力而不是启动内需？一个极端的情况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为什么采用限制总需求的政策——凭票供应？显然，问题都发生在总供给一端，用凯恩斯主义的药方是无法医治的。

由此看来，弄清一国经济态势是否与使用理论模型之前提假设一致，是经济分析工作中相当重要的环节，不可逾越。我们曾讨论过近代中国的经济态势，得出过当时属供给约束型经济的结论（刘巍，2010）。进一步地，本文拟就中国经济 60 年左右的总供求做一简单的讨论，对经济态势转变的时点做出初步判断，求教于学界的前辈和同仁。

一、总供求态势研究的基本逻辑

1. 从总供求与价格的关系角度分析

我们首先讨论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的经济学机理。从图 1 (a) 看, 供给曲线 AS_0 是典型的或极端的供给约束型经济 (虽然某些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收入不变, 但实际经济中应该少有这种极端现象), 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 在物价变动过程中, 完全是总需求曲线从 AD_1 运动到 AD_3 的位置, 导致价格由 P_1 上升到 P_3 的, 总供给没有起到压制物价向下的作用。一般来说, 供给约束条件下的总供给曲线 AS_1 不会像 AS_0 那样极端, 但应该是非常陡峭的, 在总需求向上运动时, AS_1 释放更多的产出比较艰难, 因此缓解价格上涨的作用不大。

图 1 (b) 中有两条总供给曲线 AS_2 和 AS_3 , AS_2 较之图 1 (a) 中的 AS_1 , 斜度平缓得多, 还可以处于斜度更为平缓的位置上 (图没有给出, 但可以想象到), 经济态势就变成了需求约束型。最极端的情况是, AS_3 与横轴平行。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 总需求拉动总供给的效应巨大。在图 1 (b) 中, AD_4 上升到 AD_5 时, 若总供给曲线为 AS_2 , 则价格涨幅为 $P_3 - P_2$, 产出增幅为 $Y_3 - Y_1$, 即价格升幅较小、产出增幅较大; 若总供给曲线为 AS_3 , 则产出增幅为 $Y_4 - Y_2$, 价格在 P_1 的水平上不变。因为, 价格上涨的力量均被总供给所压制, 即总供给下压价格的力量显著大于总需求抬升价格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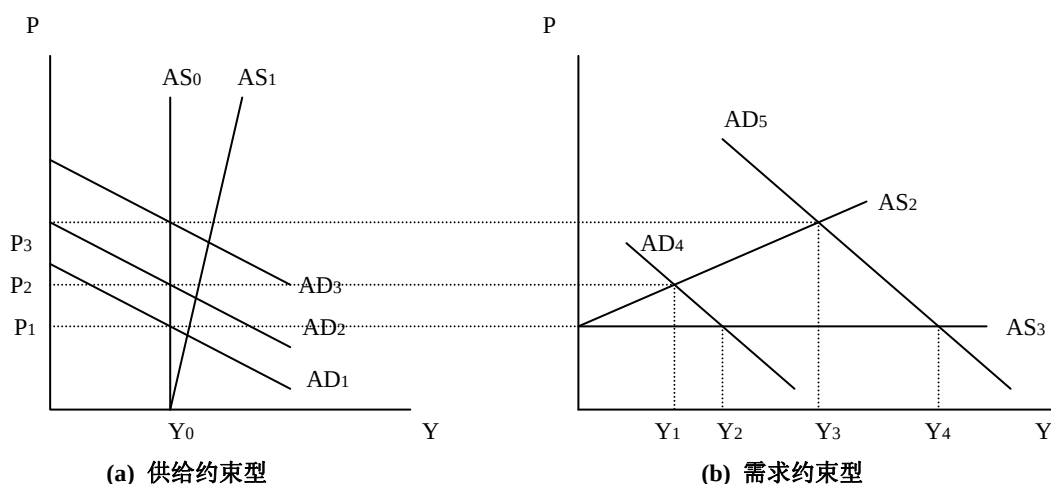


图 1 供给约束型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

若使用上述逻辑的数量模型 $P = a_0 + a_1 D + a_2 S$ 中做分析, 则有判断两个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的方法——Beta 系数。由于偏回归系数与变量的原有单位都有直接的联系, 单位不同, 彼此不能直接比较。为此, 可以将偏回归系数转换为 Beta 系数, 其公式如下:

$$\beta_j^* = \beta_j \frac{s_x}{s_y} = \beta_j \sqrt{\frac{\sum (X_{ji} - \bar{X}_j)^2}{\sum (Y_i - \bar{Y})^2}} \quad (j=1,2,\dots,k; i=1,2,\dots,n) \quad (1)$$

Beta 系数就是按照解释变量的标准差与因变量的标准差之比例对估计的斜率系数进行调整, 其数值与测定变量时的单位无关, 即是一个“纯数”, 因此可以直接比较, 用以确定计量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在图 1 中, 总需求的 Beta 系数就是 AD 推动价格向上运动的力度, 总供给的 Beta 系数就 AS 向下压迫 P 的力度。显然, 在供给曲线陡峭时, 总

需求的 Beta 系数应该显著大于总供给的 Beta 系数。反之则反是。

2 从贸易条件角度分析

贸易条件概念最初的含义只是进、出口之间的比价，所谓贸易条件的恶化或改善最初也只是进、出口价格指数的相对上升或下降，即价格贸易条件。在以后的贸易实践中，贸易条件的改善或恶化，成了评价一国国际贸易绩效的重要考量指标。

贸易条件学说其实暗含着“供给约束型经济”这一假设。即使穆勒时代没有这个词，也有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思想存在了。恐怕也只有在此前提下，方可以此学说考量贸易绩效。不管穆勒时代（或之前）供给“瓶颈”在哪个层面上，只要是供给约束成立，供给曲线陡峭、或与横轴垂直，供给量就与价格关系不大或无关了。于是，当供给量一定时，提高贸易利润率的途径只有提高价格。假定贸易双方都是供给约束型的国家，于是，两个价格之比绝对就是利益之比了。如果进出口价格指数能大略算出来的话，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的走势应该是相同的或正相关的。难怪，国际贸易学早期理论常用的案例都是靠天吃饭的农业和畜牧业及这两个产业附属的加工行业——小麦、葡萄酒和呢绒。这些产业不用说都是供给约束型的，由于经济关系简单、便于分析，直到现在，国际贸易学教科书依然沿用这些案例。

综上所述，如果一国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走势呈正相关关系，该国应该是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中，反之，应该是需求约束型经济。

3. 从马歇尔—勒纳条件角度分析

马歇尔首先提出国际收支调节弹性理论，勒纳在马歇尔的弹性理论基础之上得出马歇尔—勒纳条件。之后，罗宾逊夫人做了大量工作，对其进行了修正（陈岱孙、厉以宁，1991）。它主要被用来考量一国货币的贬值与该国贸易收支改善程度的关系。众所周知，对一国来说，货币一旦贬值，在贸易品本币价格不变时，会造成出口商品外币价格的整体下降或是进口商品本币价格的整体上升，无论用哪种货币计算，价格贸易条件必将恶化。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家们为什么会考虑主动“恶化”价格贸易条件呢？问题在于，国际贸易的评价原则主要是考量总体获利程度，获利是目的，价格是手段而已。罗宾逊夫人之所以做这样的分析，是因为多数西方国家的经济态势和穆勒时代相比，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即产量是可以大幅增加的。在低价格的诱惑下，出口量是可以增长的，生产一端没有问题。此时的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从理论上说，厂商可以满足任何数量的有效需求。在马勒条件的众多假设中，四个供给弹性均为无穷大是很重要的，这基本上说明，罗宾逊夫人的分析框架是在“需求约束型经济”假设之下建立的。因此，降价刺激国外需求，薄利多销，进而在贸易收支差额上获利是新古典主义者们的理性选择。在一系列假设下，马勒条件推导出了价格贸易条件主动“恶化”可以改善总体贸易收支的基本条件：

$$E_x + E_m > 1 \quad (2)$$

式（2）中， E_x 表示对出口品需求的价格弹性， E_m 表示对进口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如果一国的经济条件满足式（2），本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根据罗宾逊夫人的推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I）当 $E_x + E_m > 1$ 时，有 $\frac{dB}{dP} < 0$ 。贸易收支变动与间接标价法的汇率变动呈反向关系，即币值越低顺差越大（或逆差越小）。

（II）当 $E_x + E_m < 1$ 时，有 $\frac{dB}{dP} > 0$ 。贸易收支变动与间接标价法的汇率变动呈同向关系，即币值越低顺差越小（或逆差越大）。

这里我们没有讨论 $E_x + E_m = 1$ 的情况,是因为在现实经济体中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很小,即使发生也是不稳定的, $E_x + E_m = 1$ 不是现实经济体的常态。

结论 (I) 表明, $E_x + E_m > 1$, 意味着需求是富于价格弹性的, 同时, 罗宾逊夫人的模型假设供给弹性是无穷大, 则此时的经济体是需求约束型经济。我们套用一下萨伊定律的句式来描述就是, 需求可以自动创造供给。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体中贸易收支变动与本国币值变动呈反向关系, 即本国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 马勒条件成立。换句话说, 马勒条件在需求约束型经济体中是适用的。

结论 (II) 表明, 当 $E_x + E_m < 1$ 时, 意味着需求是缺乏价格弹性的, 即价格对需求量的刺激能力太弱。国外需求量 (出口量) 增加产生的利益不能抵补价格下降造成的损失, 国内需求量 (进口量) 下降节省的开支不足以抵补价格上升造成的开销增加。这种情况从表面上看, 似乎是需求的问题, 其实, 这无疑是供给方面有较大的问题。首先, 在出口的外币价格下降时, 国外需求不能有效增加, 特殊商品除外, 绝大部分情况下是由于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瓶颈, 供给弹性无穷大是一句空话。其次, 进口品本国价格上升时, 国内替代产品的产量上不来或根本没有, 更是与供给弹性无穷大无缘。这说明, 当条件 $E_x + E_m < 1$ 时, 该国经济是供给约束型的, 也许货币适度升值可以改善他的贸易收支。

二、改革开放前的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分析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全国大部分地区战争结束, 和平建设开始了。1950~1952 年, 中国人民在政府的领导下医治大约十二年战争造成的创伤, 这三年被称为经济恢复时期。虽然经济恢复的成效是显著的, 但是, 仅仅是恢复而已, 短缺经济的本质没有得到改变, 且市场经济成分仍占主要地位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 1990)。1953 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一五计划的末期——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均已适应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之整体要求。政府按计划定产定价的经济运行开始之后, 首先遇到的困难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 经济负增长严重, 跌幅最大的 1961 年竟为负 27.3% (见表 7)。灾害过后, 经过调整和巩固, 计划经济的力度更强了。从 50 年代开始的“凭票供应”愈演愈烈, 波及到了大多数商品。任何一个中国普通城镇居民如果没有了票、证、券, 将寸步难行, 甚至活不成。总供给受制于意识形态“瓶颈”所导致的严重而普遍的短缺, 是苏联模式在中国催生的、接近极端现象的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然而, 因为市场机制逐步被驱逐到经济的边缘, 所以, 已无法使用以市场价格、汇率为变量的任何模型对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做计量检验。我们只能用以供给约束型经济为基本假设的模型为基础, 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加以修正, 若用中国的数据拟合方程效果很好, 则可反证其前提的成立。

众所周知,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前提假设是供给约束型经济, 即需求相对来说没有问题, 只要投入资本和劳动力、只要提高效率, 就能得到更多可以卖出去的产品。在既定的生产潜力之下, 总需求随时能够消化任何数量的总供给, 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供给一端。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若无重大突发事件的干扰, 经济总量升降的主要原因是资本要素的投入, 劳动力投入几乎失去了分析的意义, 因为在理论上人人都是就业的。从 1963 年的精简城镇 2800 万人口, 到 1968 年开始的大规模上山下乡, 全国适龄劳动者从城市向乡村遣散, 统计学意义上的失业是不存在的。既有的资本和土地加上新增的投资, 在巨大的政治热情烘托下, 吐纳着勉强使全国居民避寒果腹 (遇灾恐怕连这个底线都达不到) 的产出, 这一逻辑基本上可以概括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常态。作为市场信号的价格、利率、汇率和工资水平等, 由于市场被计划取代而失去了杠杆意义。

我们将这一逻辑程式化, 则可做出如下的函数:

$$Y = f(I, K, F) \quad (3)$$

式 (3) 中, Y 为产出, I 为新增投资, K 为资本存量, F 表示政治热情等意识形态因素 (fervour)。在统计量的安排上, 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三项投资之和代表 I , 用滞后一期的 GDP 代表当期“既有的生产能力”, 这比固定资本存量的意义更大, 包括了人力、政治热情、新制度在初期的活力和后期的惰性等等, 是函数中后两个变量的综合体现。数据见表 1。

表 1 改革开放前的主要经济数据 单位: 亿元

年份	主要投资	实际 GDP 指数	年份	主要投资	实际 GDP 指数
1952		100.0	1965	240.41	214.1
1953	97.36	115.6	1966	278.50	237.1
1954	107.55	120.5	1967	209.80	223.6
1955	110.95	128.7	1968	183.80	214.4
1956	174.47	148.1	1969	264.84	250.6
1957	162.16	155.6	1970	390.60	299.3
1958	309.32	188.6	1971	450.58	320.4
1959	397.93	205.3	1972	444.28	332.4
1960	462.01	204.6	1973	475.60	358.5
1961	168.41	148.7	1974	500.16	366.8
1962	95.95	140.4	1975	580.50	398.7
1963	135.14	154.7	1976	563.85	392.2
1964	192.06	182.9	1977	584.28	422.1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4、7、11、16 页。主要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农业基本建设支出。

我们先对这两个变量做单位根和协整检验, 见表 2、表 3。

表 2 变量的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	检验形式 (c,t,k)	DW	ADF	1%	5%	结论
lnI	1	(N,N,1)	2.09	-3.55	-2.67	-1.96	I(1)*
lnYR	1	(c,N,2)	1.99	-4.02	-3.77	-3.00	I(1)*

*表示变量差分后的序列在 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ADF 平稳性检验。

表 3 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 (P值)	5%临界值	$\lambda - \max$ 统计量 (P值)	5%临界值	原假设
0.53	22.61 (0.02) *	20.26	17.28 (0.03) *	15.89	0 个协整向量
0.21	5.33 (0.25)	9.16	5.33 (0.25)	9.16	至少 1 个协整向量

*表明在 5%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P 值为伴随概率。

然后, 我们用经典最小二乘法实证, 回归模型如下:

$$\ln Y_t = 0.23 \ln I_t + 0.83 \ln Y_{t-1} + [AR(1) = 0.57] \quad (4)$$

$$t_1 = 3.26 \quad t_2 = 15.45 \quad R^2 = 0.95 \quad DW = 1.63$$

模型(4)的各项检验说明,模型拟合的效果很好,数据经验完全支持我们的逻辑分析。我们可以据此反推,自1952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呈供给约束型态势。总需求必须适应水平低下的总供给,最严重时几乎达到了商品的“配给制”——生产资料不用说了,连消费品也是大面积凭票供应的。进一步思考,当时约束经济增长的瓶颈——总供给的瓶颈在于哪个层面呢?从今天的经验来看,应该在于制度层面,难怪后来有人认为“改革也是生产力”,这种说法虽然不太准确,但是有道理的。

三、改革开放之后经济态势转折点：商品市场角度的分析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主要精神是,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体制改革。从此,中国在改革开放旗帜下的经济变革开始了。市场逐渐回到经济的中心位置上,价格等市场信号开始发挥应有的作用了。改革开放是在十年文革的烂摊子上展开的,要克服的困难是相当大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僵化教条且不论,就经济本身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底子太薄所造成的储蓄少,从而投资不足,进而产品短缺。当时,城市里“储蓄一元钱,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横幅标语随处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市场上的商品逐渐丰富,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逐渐向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转化。然而,这个转化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渐进过程。我们用表4所列数据,遵循本文第一节的逻辑框架,尝试判断质变发生在1978~2008年这一时段的哪个时点附近。

表4 改革开放之后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年份	1978年价格GDP	GDP平减指数 (1978=100)	狭义货币	年份	1978年价格GDP	GDP平减指数 (1978=100)	狭义货币
1978	3645.200	100.0000	948.5000	1994	16505.46	292.0117	20540.70
1979	3922.235	103.5787	1177.100	1995	18309.84	332.0275	23987.10
1980	4228.432	107.5008	1443.400	1996	20143.38	353.3499	28514.80
1981	4450.789	109.9041	1710.800	1997	22013.36	358.7503	34826.30
1982	4851.761	109.7210	1914.400	1998	23737.54	355.5646	38953.70
1983	5380.315	110.8244	2182.500	1999	25549.21	350.9976	45837.30
1984	6196.840	116.3190	2931.600	2000	27699.88	358.1771	53147.20
1985	7031.591	128.2213	3340.900	2001	30000.00	365.5174	59871.60
1986	7654.920	134.2300	4232.200	2002	32726.61	367.6908	70881.80
1987	8540.704	141.1898	4948.600	2003	36007.29	377.2092	84118.60
1988	9503.037	158.2946	5985.900	2004	39637.91	403.3470	95969.70
1989	9889.427	171.8229	6382.200	2005	43771.56	418.8276	107278.7
1990	10268.53	181.7962	6950.700	2006	48871.20	433.6368	126035.1
1991	11212.64	194.2585	8633.300	2007	54703.52	456.1497	152560.1
1992	12809.23	210.1882	11731.50	2008	59626.83	504.2599	166443.1
1993	14595.38	242.0896	16280.40				

资料来源:2007年及以前资料见《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8年各期,2008年数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26日)。

与前面的数量分析同理，我们先对数据做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见表 5 和表 6。

表 5 变量的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	检验形式 (c,t,k)	DW	ADF	1%	5%	结论
lnM	2	(N,N,0)	2.01	-6.88	-2.65	-1.95	I(2)*
lnY	2	(c,N,1)	2.08	-3.78	-3.77	-3.00	I(2)*
lnP	2	(N,N,1)	1.90	-4.65	-2.65	-1.95	I(2)*

*表示变量差分后的序列在 1%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ADF 平稳性检验。

表 6 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 (P值)	5%临界值	$\lambda - \max$ 统计量 (P值)	5%临界值	原假设
0.615	34.15 (0.002) *	24.28	27.68 (0.001) *	17.80	0 个协整向量
0.147	6.47 (0.38)	12.32	4.60 (0.54)	11.22	至少 1 个协整向量
0.062	1.87 (0.20)	4.13	1.87 (0.20)	4.13	至少 2 个协整向量

*表明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P 值为伴随概率。

接下来，我们根据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做了几次尝试。效果最好的时点是 1995~1996 年。回归模型 (5) 是用 1978~1995 年的数据拟合的，各项检验指标表明，模型的效果是很好的。

$$\ln P = -133.81 \ln Y + 160.31 \ln M_1 + [AR(1) = 0.73] \quad (5)$$

$$t_1 = -3.66 \quad t_2 = 4.34 \quad R^2 = 0.96 \quad DW = 1.26$$

由 Beta 系数公式计算得，lnY 的 β 系数绝对值为 1，lnM1 的 β 系数为 2.32。后者是前者的两倍多，说明这一时期影响价格的重要变量是总需求，而总供给影响价格的能力显著弱于总需求。因此，1978~1995 这一时段的经济态势应该是供给约束型的。

用 1996~2008 年的数据拟合总供求与价格方程时，效果不显著。于是，我们转换了思路。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总需求，即产出是总需求的函数。于是，我们用货币流量代替总需求与 GDP 拟合方程，如式 (6)。

$$\ln Y_t = -0.506 \ln M_t + 0.803 \ln P_{t-1} \quad (6)$$

$$t_1 = 66.83 \quad t_2 = 56.03 \quad R^2 = 0.999 \quad DW = 1.00$$

在式 (6) 中，直接用货币流通速度这个事后算出来的变量是不合适的，我们采用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期因素——滞后若干期的价格做解释变量，即 $V = f(P_{t-n})$ 。因为，货币支出的速度应该取决于市场主体对价格的预期，即 $V = f(P^{\text{exp}})$ ；而对价格的预期应该是基于最近过去的价格变动经验作出的，即 $P^{\text{exp}} = f(P_{t-n})$ 。用这样的逻辑拟合的方程效果很好，从另一角度证实了 1996~2008 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总需求，^①即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

^①用同样的方法拟合 1978~1995 年的方程，效果极不显著，说明在该时段中总供给不是总需求的函数。

济时代，中国经济由“控制集团购买力”时代过渡到了“扩大内需”时代。

需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长时间内实施“出口导向”经济战略，出口商品价格和汇率的市场化程度是逐步提高的，问题比较复杂，不像中国近代时期那样“纯市场”。^①限于篇幅，本文暂不从贸易条件和马勒条件角度再做分析。

四、简单的结论与尚待研究的问题

根据本文所做的逻辑分析和数量分析，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从1952年到1995年，中国基本上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中，多年的战乱结束了，但经济却陷入了低水平循环的困境之中，短缺问题愈演愈烈。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在1996年左右发生了质的变化——储蓄大于投资，进入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由总供给转变为总需求了。

2.在研究1995年以前时段的经济问题时，切不可使用以“有效需求不足”为大前提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而研究1996年之后的中国经济问题时，采用新古典理论框架也可能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的。

3.在研究1957~1977这一计划经济时期经济问题时，选择理论框架要特别谨慎。任何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是暗含“资源由市场配置、价格信号真实有效”这一基本前提的，如无重大修正，切不可生搬硬套。但是，这里又极富学术挑战性，构建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理论框架并合理解释经济运行中的现象，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4.在供求态势领域中，尚待研究的问题很多，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在中国宏观上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时，有没有哪个行业是处于需求约束态势中的；在近年来的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有哪些行业是供给约束型的，供给的“瓶颈”在于哪个层面，是制度约束、技术约束还是资源约束？弄清这一问题，对中国的中观经济和经济史研究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 <美>埃德温·查理：《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2. 刘巍：《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
3. 陈岱孙、厉以宁：《国际金融学说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4. <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The economic change from supply constraint to demand constraint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situation since 1952

Abstract: to make certain of whether a country's economy is under supply constraint or demand constraint comes within applying a theory framework correctly and is the elementary premise to choose the hypothesis of a theoretical mode and study economical operation. Firstly, we should make corresponding logical decision of economic situation at special time based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aggregate supply and price、terms of trade and 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etc., then confirm the decision using econometric technique, thereby firmly believe it is supply constraint or demand constraint at this time. Analyses show Chinese economy is under supply constraint and

^①详见拙文：《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

deficient in savings until 1995 in modern times, and the key of economic growth lies in supply. Since 1996, Chinese economy is demand constraint, and the savings is above the investment, thus the engine of economic growth is aggregate demand.

Key words: supply constraint, aggregate supply and demand, terms of trade, Marshall-Lerner condition

作者简介:

刘巍, 男, 1960 年出生, 黑龙江哈尔滨人, 经济学博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分会理事, 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广东省经济学会中青年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广东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研究方向为货币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史。

联系电话: 13929525214, 020-36641251 (Fax)

电子邮箱: ssxx1975@mail.gdufs.edu.cn, 13929525214@139.com

通讯地址: 广州市白云大北 2 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 510420

英法德意四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基于 20 世纪 60~80 年代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

陈 昭

内容提要：通过对英法德意四国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之规律分析，发现四国消费和经济增长近似同步变动，因为双方互为因果，双向正反馈，并且消费对经济增长之作用力呈现逐次降低态势，而经济增长对消费作用力则呈现“倒 V”形态。高消费高增长相伴而生，其基础条件是稳定而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产业就让百姓倾其所有的政策是不能使经济得到稳定而长期的发展，这是典型的舍本逐末，是经济发展的短视策略。

关键词：欧盟四国；消费与经济增长近似变动性；计量经济史

当前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大都在经济史上曾经发生过，历史虽不能重演，但仔细研读就会发现，何其相似乃尔！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之路，恰恰是中国已经经历、现在面对或者将要经历的。经济发达国家主要密集于欧洲，尤其以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这些国家都毫无例外的经历过通货膨胀、贸易逆（顺）差、就业不足、国际收支不平衡、经济周期性波动。上述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治理经验与得失，无疑是人类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宝贵财富。

20 世纪 60-80 年代，是英、法、德、意四国经济发展最为快速时期，毫无疑问，这时期，这些国家都进入了需求约束性经济发展阶段，主导这些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因素是什么？内需还是外需？有何规律性和可资借鉴之处？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目前经济快速增长条件下，经济转型的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英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几个方面：比如，低碳经济等热门领域；对汽车业、房地产、对外贸易等部门和行业的研究。对于法国经济问题的研究集中于：中小企业，小农经济。对德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有：贸易、社会市场经济、循环经济、食品。对意大利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产业区经济、低碳经济等。从研究范围来看，对于英国和德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围较宽泛，而对于法国和意大利经济问题的研究则相对集中。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还属于逻辑阐述、事实归纳，较少涉及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分析。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是单一国家某一产业和行业的研究，基本没有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从研究领域来看，对上述四国的研究绝大部分属于微观范畴，较少涉及到宏观领域。和本文研究有近似性的前期成果主要有：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事司（2009）认为消费之所以能在欧盟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由欧盟的经济结构和相关体制决定的。具体看，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1.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有利于消费的增长。2.国民收入大幅度向居民倾斜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增长。3.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消除了消费者的后顾之忧。张严方（2008）¹从法理角度分析了欧盟消费者政策一体化以及对消费者的保护，说明了欧盟在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方面的牢固基础，能够及时有效地保障消费者权益。彭金玉和夏少敏（2004）分析了欧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消费信贷的发展状况，表明欧盟消费信贷种类完善、层次清晰，对于促进欧盟消费的力度和作用效果明显。如果说上述理由确实保障和增进了欧盟的消费，消费在多大程度上拉动了经济增长？文中却没有给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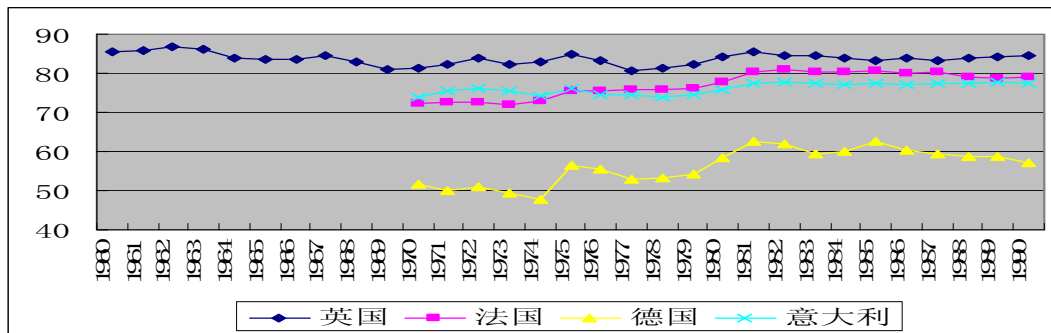
上述成果的研究可以归纳为定性分析,是以逻辑阐述为主,主观判断居多,数量分析较少。同时,纵向分析为主,缺少横行比较研究。基于此,本文从数量分析角度出发,采用横向比较视角进行分析,进而归纳总结,得出结论和启示。

二、英法德意四国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状态分析

为了增强分析的可比较性,我们统一采集同一机构、同种指标、同一计算方法得到的四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

出于数据的可得性,英国所用数据为1960-1990年,其余三个国家为1970-1990年,德国为联邦德国数据,均来自于<http://stats.unctad.org/Handbook/TableViewer/dimView.aspx>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下同。我们计算了四个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结果绘制成图1,这样可以清晰看出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趋势。

图1 1960-1990年英、法、德、意四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可比价,单位:%)



从图1可以看出,英国消费占GDP的比重最高,其次是法国,再次是意大利,最后是德国。其中,法国和意大利的数值比较接近,但都略低于英国,德国的比重明显低于其他三个国家。在整个1960-1990年代,英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80-87%之间,均值为83.7%。法国只有在1980-1990年期间的比重接近80%,其余时段在70-80%之间徘徊,均值为77.04%。意大利的这个比重则相对变化缓慢,起伏不大,整个研究区间稳定在73-78%之间,均值为76.12%。德国消费占GDP的比重在四个国家中最低,主要时间一直维持在47-60%区间运行,只有四个年份达到和超过了60%的比例,并且变化幅度最大,其均值为56.21%。

上述绝对数的分析与比较掩盖了增长速度的快慢,我们单独计算了消费与GDP增长速度的比较,制成图2-图5。

图2 1961-1990年英国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可比价,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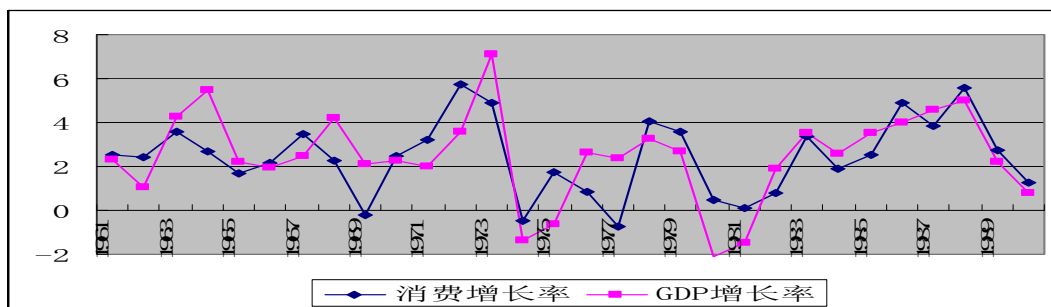


图 3 1971-1990 年法国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可比价，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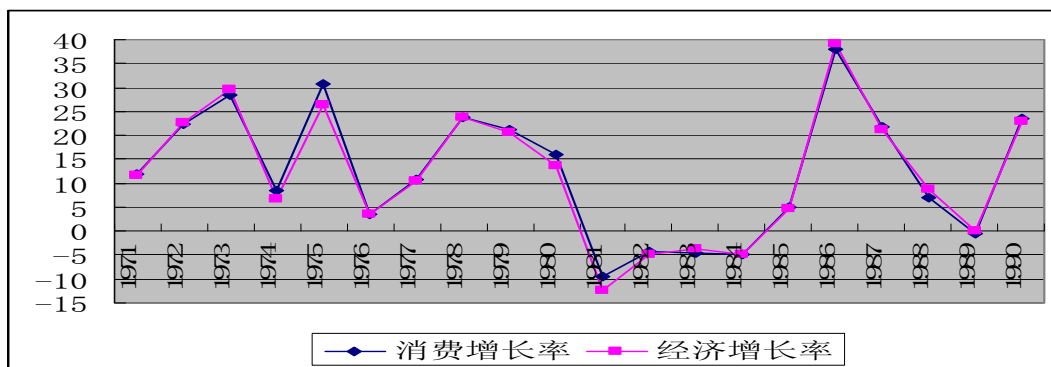


图 4 1971-1990 年德国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可比价，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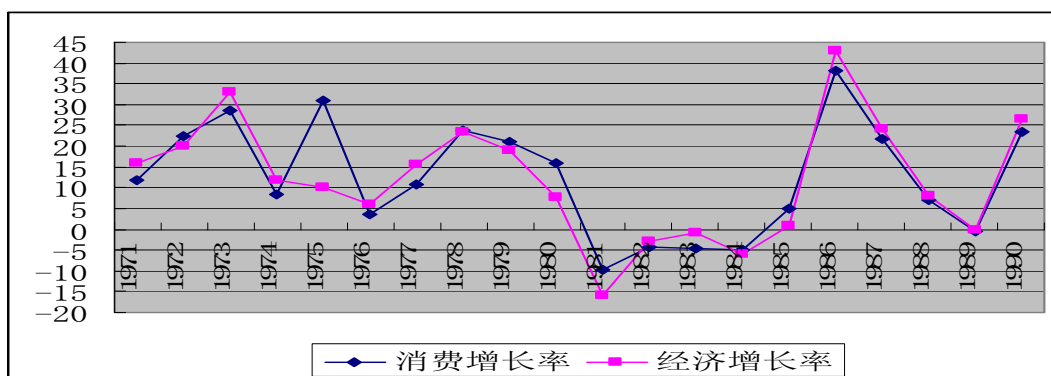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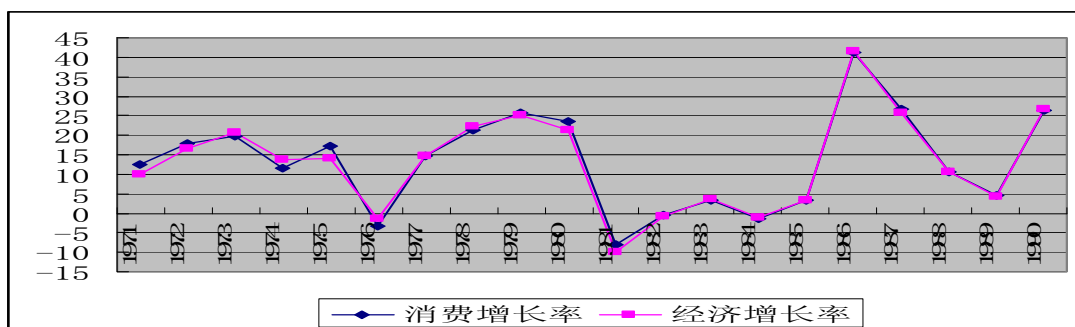


图 5 1971-1990 年意大利消费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比较（可比价，单位：%）



从上述图 2-图 5 可以看出，法国和意大利消费增长率和 GDP 增长率的走势极为近似，英国和德国这两个指标不同于法意两国，有些偏离，但是趋势却保持高度一致。我们把消费增长率和 GDP 增长率这种特点称之为近似同步性。四个国家两项指标何以有如此近似同步性？显而易见，两者关联度极强。一个问题是：是消费推动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引致了消费？

三. 四国消费和经济增长关联度分析

从经济学的逻辑角度出发，我们知道，消费和经济增长互为影响，因此我们尝试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法来判断两个变量的传递顺序，然后通过宏观经济联立方程建模方法考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总效果。格兰杰因果检验首先要给出最优滞后期，我们通过 AIC 和 SC 准则来

确定。

首先建立 VAR 模型，通过 AIC 和 SC 准则确定最优值后期数，即使上述两个准则达到最小值的滞后期。最优滞后期数和对应的 AIC 和 SC 数值如下表所示。

表 1 最优滞后期的确定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最优滞后期	2	1	1	1
AIC 值	7.59	12.09	14.88	11.64
SC 值	8.07	12.39	15.18	11.94

根据上表确定的最优滞后期，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 四国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国家	原假设	滞后期	F 统计量	伴随概率
英国	经济增长率不是消费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2	17.2452	0.02005
	消费增长率不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2	14.4090	0.02573
法国	经济增长率不是消费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1	9.12690	0.03536
	消费增长率不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1	8.68070	0.03653
德国	经济增长率不是消费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1	16.3483	0.02192
	消费增长率不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1	1.98750	0.06617
意大利	经济增长率不是消费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1	26.7595	0.01213
	消费增长率不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1	20.4498	0.01719

上表检验结果表明，除了德国“消费增长率不是经济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在 10% 的显著水平上被拒绝外，其余原假设均在 5%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对四个国家而言，其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互为因果。除此之外，我们还关心，两者既互为因果，那么影响程度如何呢？在这个系统中，哪个指标起到更为主导和引领作用？针对上述疑问，我们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求证。

脉冲响应结果如图 6-图 13 所示。

图 6 英国消费增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增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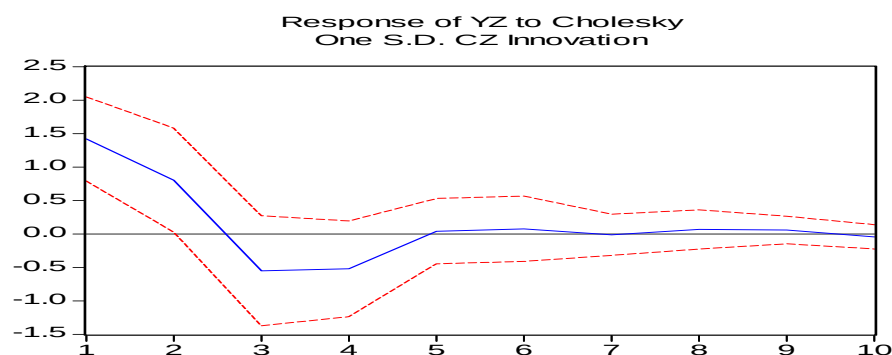


图 7 英国经济增长增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消费增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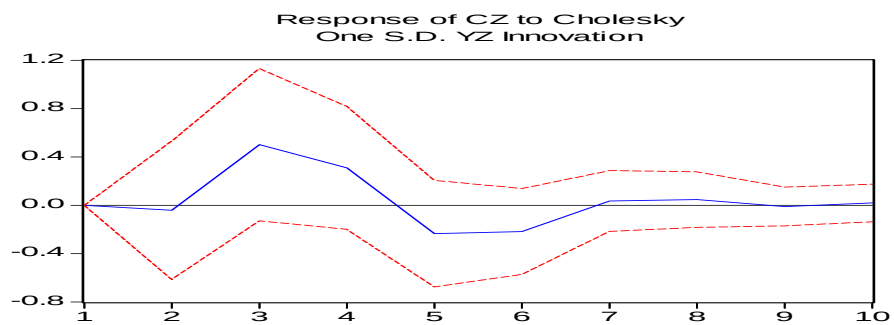


图 8 法国消费增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增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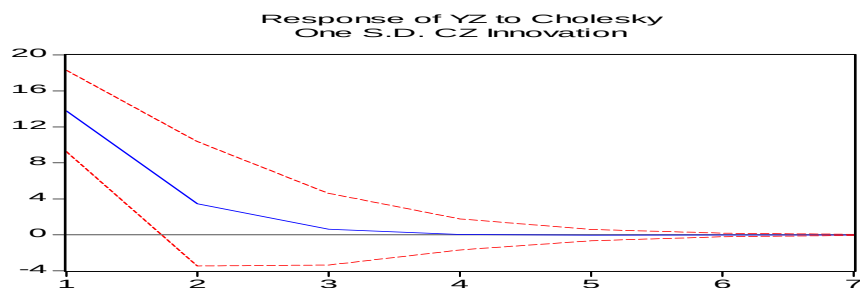


图 9 法国经济增长增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消费增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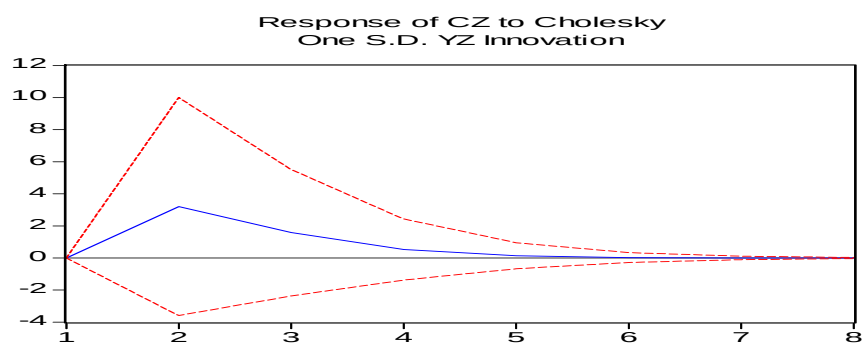


图 10 德国消费增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增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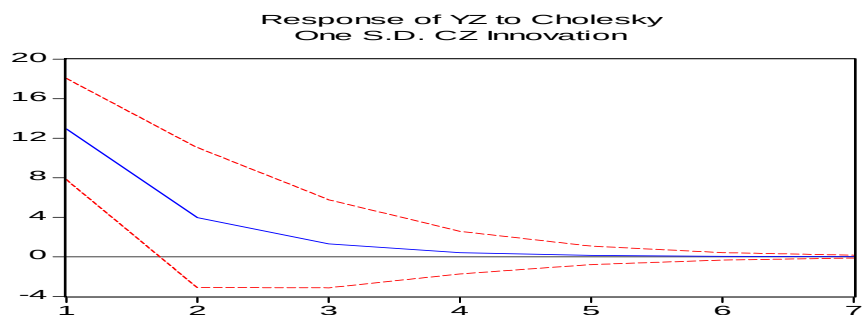


图 11 德国经济增长增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消费增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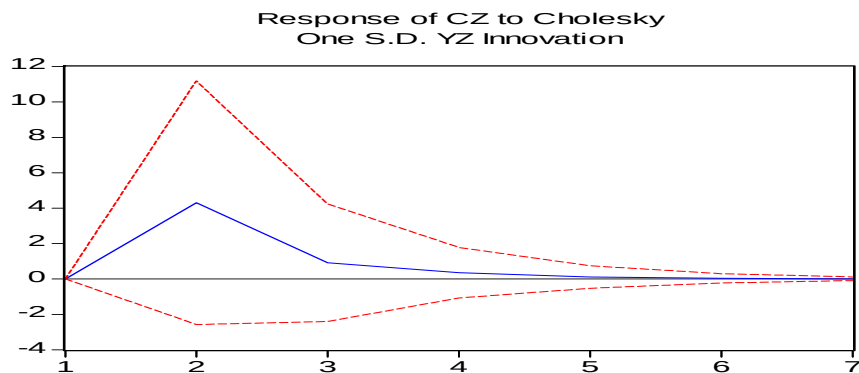


图 12 意大利消费增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增速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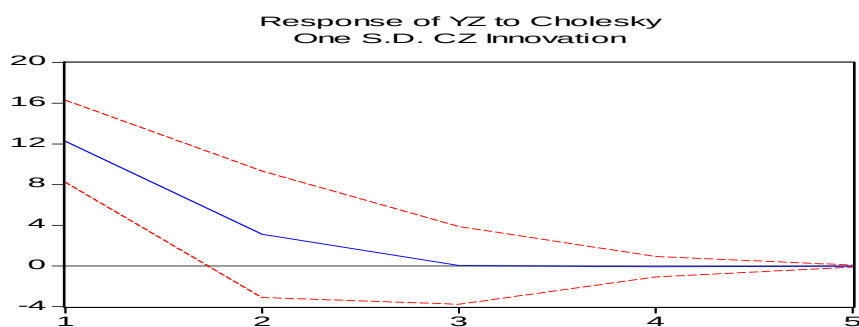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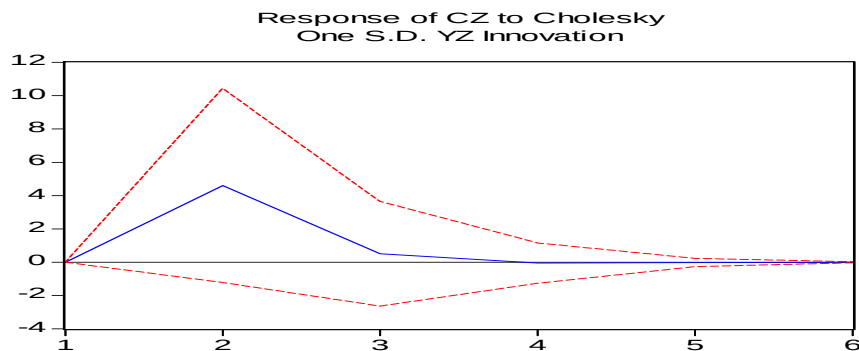


图 13 意大利经济增长增速一个标准差的变化对消费增速的影响



从图 6-图 13 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消费增速对经济增长增速的影响中，作用力度都是从高到低的趋势，即当期影响最高，作用力度然后逐次下降，到第三期或者第四期的时候，消费作用力基本消失。经济增长增速对消费增速的影响中，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在第二期达到最高，第三期作用力基本消失，形态呈现一个“倒 V”型。

这样，综合脉冲响应图，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四国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力度呈现递减形态衰减；经济增长对消费作用力度先递增后递减。随之的一个问题是，消费的作用力度具体是多少呢？用消费启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多大呢？这就需要经济系统分析方法才能得出变量相互反馈后的数据。

四、联立方程模型的一个解析

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我们尝试建立如下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

$$\text{消费方程: } C_t = \alpha_0 + \alpha_1 Y_t + \alpha_2 C_{t-1} + u_{1t}$$

$$\text{投资方程: } I_t = \beta_0 + \beta_1 P_t + u_{2t}$$

$$\text{出口方程: } X_t = \phi_0 + \phi_1 e_t + \phi_2 YF_t + u_{3t}$$

$$\text{进口方程: } M_t = \theta_0 + \theta_1 e_t + \theta_2 Y_t + u_{4t}$$

$$\text{收入方程: } Y_t = C_t + I_t + G_t + X_t - M_t$$

其中: C_t 消费; Y_t 国民收入; I_t 投资; P_t 消费价格指数; X_t 出口; e_t 汇率(间接标价法); YF_t 外国国民收入(我们采用贸易额加权数); M_t 进口; G_t 政府支出。所用数据为 1960-1990 年,德国为联邦德国数据,均来自于 <http://stats.unctad.org/Handbook/TableViewer/dimView.aspx>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数据库)。

消费方程考虑到消费的传递性和惯性;投资方程是因为我们发现利率不是主导投资的重要变量,从微观角度出发,我们选择消费价格指数作为自变量,即考虑投资的动机。进、出口方程则符合一般理论模型。

四国联立方程模型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3 四国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结果

英国	法国
$C_t = 4808.65 + 0.75Y_t + 0.16C_{t-1}$ $I_t = 62786.14 + 711.93P_t$ $X_t = 11.45 - 0.31e_t + 0.004YF_t$ $M_t = -15.75 + 5.18e_t + 0.05Y_t$ $Y_t = C_t + I_t + G_t + X_t - M_t$ 英国消费贡献率 = $\frac{\alpha_2}{1 - \alpha_1 - \theta_2} = 0.8$	$C_t = 40620.47 + 0.82Y_t + 0.156C_{t-1}$ $I_t = 145213 + 732.59P_t$ $X_t = 10.54 - 11.15e_t + 0.0008YF_t$ $M_t = 13.85 + 28.3e_t + 0.0025Y_t$ $Y_t = C_t + I_t + G_t + X_t - M_t$ 法国消费贡献率 = $\frac{\alpha_2}{1 - \alpha_1 - \theta_2} = 0.88$
德国	意大利
$C_t = 42301.87 + 0.85Y_t + 0.095C_{t-1}$ $I_t = -102650 + 4453.91P_t$ $X_t = 11.53 - 64.99e_t + 0.0051YF_t$ $M_t = 5.37 + 39.85e_t + 0.0035Y_t$ $Y_t = C_t + I_t + G_t + X_t - M_t$ 德国消费贡献率 = $\frac{\alpha_2}{1 - \alpha_1 - \theta_2} = 0.65$	$C_t = 47423.49 + 0.49Y_t + 0.37C_{t-1}$ $I_t = 16521.7 + 2551.2P_t$ $X_t = -0.51 - 1.38e_t + 0.00076YF_t$ $M_t = 2.02 + 4.69e_t + 0.0012Y_t$ $Y_t = C_t + I_t + G_t + X_t - M_t$ 意大利消费贡献率 = $\frac{\alpha_2}{1 - \alpha_1 - \theta_2} = 0.72$

对图 1 和表 3 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两个结果相互印证。英法两国消费占 GDP 比重高,则其作用力度也大。反之则反是,尤其是德国,消费的比重小,作用力度在四国中也最小。图 1 我们计算的是消费的长期比重,表 3 我们计算的则是在样本期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率。

五、结论与启示

至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因为消费主导四国的经济增长,其贡献率均远远超过了50%,同时经济增长本身又引致消费,所以四国经济增长和消费呈现出一种近似同步规律,即四国消费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力度很大,而且具有双向正反馈效应。

综观四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医疗保障政策、社会福利政策、公共住房政策等等,体现出了对社会公平和缩小贫富差距的政策导向,也是这些国家民选政府的执着追求,体现出民生为本的执政理念。“到了1935年左右英国福利制度覆盖人口超过50%,社会福利支出也达到当时国民总收入的10%。并且到1936年,英国1%最富有人口拥有的财产占全部私有财产的比例,由1911-1913年的70%下降到50%。”^①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意大利银行行长弗朗切斯科·马塞拉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指出,看来,这种做法意味着,出口和私人投资将不再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功能,这种功能将改由公共部门发挥。”^②“为了刺激内需,这次不是新建和改造基础设施的硬件和软件,而是提高退休金(1968年11月)和政府公务员的薪金(1969年的头几个月)”。^③

由此可见,高收入向高消费演变,需要夯实的系列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免除后顾之忧,才会将高收入用作高消费,进而形成需求引导下的经济良性循环发展。而由低收入向高消费的引导,收入的增加保证了可能性,良好的社会保障系统则是赖以循环的坚固基石。教育、医疗、住房等等涸泽而渔式的倾尽百姓之财,不仅丧失民生消费之本,还将导致经济发展迅速之末。

主要参考文献:

- [1]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事司. 欧盟及主要成员国扩大消费的主要经验[J].宏观经济管理, 2009(3).
- [2] 张严方. 欧盟消费政策[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 [3] 彭金玉,夏少敏. 欧盟成员国消费信贷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04(9).

Consumption`s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 Britain,

France,Germany,and Ita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with the Model of Simultaneous

Equation from 1960 to 1980

Chen zhao

Abstrac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British,French,German and Italian consumption and the regul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we can conclude that four countries` consumption is appropriate to economic growth in terms of causality of both sides which is positive. What`s more, the consumption`s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is becoming progressively weak and the inverted V situation appears. High consumption attaches high growth on the basis of stabl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industry can not get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if the

^① W.H.B 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2页。

^② Luigi De Rosa 著,罗红波译《战后意大利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③ Luigi De Rosa 著,罗红波译《战后意大利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policy can not benefit people, which is typically improper. The policy is the short-sighted strategy.

Key words: four countries of European Union, the appropriateness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liometrics

作者简介:

陈昭, 男, 1972 年出生, 黑龙江庆安人, 经济学博士, 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会员, 研究方向为: 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史学。

联系电话: 13580309162, chenzhao2002@mail.gdufs.edu.cn

地址: 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 510420

近代中国货币流通速度考察（1887~1936）

崔文生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交易方程式计算了中国1887~1936年M1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并对这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影响这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主要是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和由于国内外白银比价变动导致的白银流入与流出。

关键词：中国近代 货币流通速度 货币化 白银流动

货币流通速度，即是单位货币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指一年）的平均周转次数。研究货币流通速度最早的学者是配第，他第一个提出了货币流通速度函数，但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恐怕是开启了货币需求理论的古典货币数量论者欧文·费雪，他在其交易方程式中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甚至是中期内保持不变。马克思也把货币流通速度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是货币流通速度决定货币流通量而不是相反，并且货币流通速度长期来看是具有自动稳定倾向的加快趋势。与古典货币数量理论不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说”或“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流通速度不是常数，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函数，但是基本上是稳定的、可测的函数，甚至“比消费函数或其他主要函数更为稳定”。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一书中指出，在9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货币流通速度的大致趋势是在长期内以平均每年略高于1%的速率下降，但是具体又呈现出“U”型走势，从1880年的4.97下降到1914年的1.91，1914~1929年无明显变动，1929~1946年稍有下降，1946年以后开始回升，但仍低于1920年和1914年的水平。米什金（2002）计算了1915~1999年美国的M1和M2的流通速度，对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和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做了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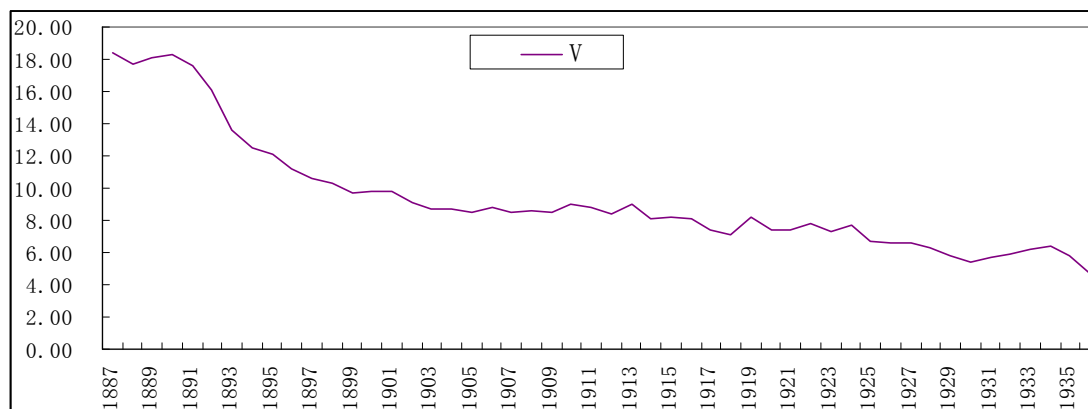
由于缺少近代连续的货币量和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实证研究的文献在本文以前还不曾出现。货币流通速度数据的缺失，使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货币状况、总的经济运行状况、物价变动状况以及其他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大打折扣。同时，货币流通速度数据的缺失，也使我们验证货币需求理论、货币供给理论、利率理论等相关经济理论的工作受到一定的影响。刘巍（2010）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近代的货币量和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估算，将相应的连续数据上推到了1887年，我们根据他的研究成果，试着对中国近代（1887~1936）的货币流通速度做一考察，并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补充这一空白，以求对以后的研究工作做相应的铺垫，并求教于方家。

一、1887~1936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

根据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式 $MV=PT$ ，我们尝试计算出中国近代的货币流通速度。交易方程式中，M表示货币存量，P表示价格，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T表示市场商品交易量。由于市场商品交易量包含大量的中间产品交易，且近代相关的统计数据几乎为零，所以用最终产品GDP的数据Y来代替，这样计算的货币流通速度又称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对于M的选取，我们在此选用M1而不选用M2，主要是考虑中国从19世纪80年代才开始由传统的封闭式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货币化程度很低，且我们在后面要结合这一时期的价格变

化趋势一起分析，而 M2 层次的货币不是全部、直接和市场上的商品对话的，对物价的影响是部分的、间接的。因此，我们选用 M1 计算出 M1 的货币收入流通速度，制成图如下。

图 1 1887~1936 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



资料来源：根据本文附表计算和制作

数据显示，中国货币流通速度在此期间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从最初的 18 左右下降到 1936 年的 5 左右；其中 1930-1934 年又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短暂的上升趋势，货币流通速度从 5.41 上升到 6.43。同时我们观察到这一时期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与国外同期相比非常之高，尤其是 1890 年前后，达到了 18 左右，远远超出同期美国 3-4 左右的货币流通速度。难道是我们的交易制度、交易技术都大大地超过美国吗？显然不是，原因只能是我们的货币化程度远远低于美国，我们国民经济的货币化才刚刚开始。

货币流通速度如此之高意味着什么呢？最直接地，它表明在这一时期，大部分居民手中的钱很少，即使有时得到一点钱，也会很快将其花出去，这一景象应该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的。但是，这个速度是否有些太快了，超出了实际可能的交易流通速度太多？可能是的，因为我们在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时用 Y 代替了商品交易量，而实际上由于中国当时还处在一种以传统的自然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农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仍然最大，农业产值中很大一部分是自给自足的或以物易物的非商品化的、非货币化的产值，因此使得 Y 的数值要远远的高于商品交易量的数值。国内市场商品量的数据非常匮乏，以我们所见，只有吴承明先生估计的几个离散数据，如下表：

表 1 国内市场商品估计量

单位（亿元）

年份	1869	1894	1908	1920	1936
商品量	9.28	12.67	21.99	72.54	127.71
Y		134.80	159.38	183.02	309.40

资料来源：国内市场商品量来自吴承明《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Y 值取自附表。

仅以这四对数据简单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在此期间有所提高，也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随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并且货币的交易流通速度与收入流通速度的偏离程度会越来越小。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总收入的结构比例的变化来考察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原因。收入可以分为消费和储蓄两项，当储蓄增加时，这一新增加的储蓄就退出了商品流通范畴，这一部分货币就停止流通，使得总的平均的货币流通速度减慢。那么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收入结

构比例是如何变化的呢？根据罗斯基（1989）的研究，在1914/1918~1931/1936年间，中国个人消费在总支出中的比例从88.7%减少到83.3%。^①即在此期间，我国居民的消费比例降低，储蓄比例提高了。从民族习惯来讲，中国人的储蓄倾向较高，即使是放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在刚进入市场经济的近代中国，原始资本积累很不充分，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最大且增长缓慢，人口众多且人均收入很低，所以主动性地增加储蓄显然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储蓄倾向增加，就不可能是主动性的储蓄增加，而只可能是被动储蓄的增加，在近代中国，就是被列强掠夺所导致的被动储蓄的增加。近代中国对外的赔款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泛，其中主要是三个方面，即战争赔款、教案赔款和商务赔款，仅战争赔款一项，按史学界最低的统计数字计也达到了十亿两白银以上，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1倍，相当于全国4亿多人口每人2.5两白银，而中国当时的农民可能三年挣不到1两白银。此仅为战争赔款，尚未计教案赔款和商务赔款，具体数字在此不一一列出。因此可以说，被迫向列强支付的各项赔款导致的被动储蓄增加，是中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者，为何1930~1934年间货币流通速度表现出短期的上升趋势？据闻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傅筑夫先生认为金银比价问题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不应被忽视的重要领域，因为它是解释中国近代经济发展中许多特殊现象的钥匙^②。刘巍（2009）通过对中国1910~1935年的货币供给决定机制的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表明，近代中国的货币量是银价变动导致的白银国际流动和国内金融机构的货币创造力度决定的，认为1910~1935年中国的货币供给属“不可控外生变量”，即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受制于国际银价与国内银价比价变动而引起的现银流入或流出。从此视角观察，二十世纪30年代美国收购白银，白银国际价格提高，国内白银持续流出，国内货币供应量收缩，货币流通速度提高。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内白银也出现了外流现象，货币流通速度也有所上升，只是不如1930~1934年这一波上升更为明显。现银流出流入数据见附表。

二、中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影响我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主要因素为中国近代经济商品化程度即货币化程度的加深和国内外银价比价变动而引起的现银流入或流出。白银流量数据我们可以从孔敏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得到1888~1931年的中国白银的进出口量，这一组数据的单位为关平两，我们按1关平两=1.55元换算为国币元，1932~1935年的数据取自《海关报告册》，1935年的数值加入了走私出口的估计量。如何衡量中国近代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如前所述，由于国内市场商品量的数据非常匮乏只有吴承明先生估计的几个离散数据，要以此进行实证分析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考虑使用罗斯基的1903~1936年中国近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估计值近似替代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罗斯基借鉴英格瓦·斯文尼尔森研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经济使用的方法，采用离散物量指数计算出国内近代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通过构建水泥、钢铁、机械等表观消费量的时间序列，得出国内近代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度估计值。近代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主要是近代化部分的增长，传统经济部分中的主体——农业增长应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近代化经济肯定是商品化的经济。对于近代化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演进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供求两个角度分析，从供给角度讲，近代化固定资本投资增加，使得商品的长期生产能力增加，商品的供给增加，经济的商品化和货币化程度加深。从需求角度讲，厂商在面临需求的增加时，首先是通过提高劳动强度、增加人手等变动成本来提高产量，当如此还不能满足需求时，厂商就会进行新

^①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2页。

^②转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44页。

增的固定资本投资,扩大厂房、增加设备等等。所以,从需求角度来讲,近代化固定资本投资的增加,是近代经济商品化程度加深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讲,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加深,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白银流入增加,货币供应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据此逻辑分析,我们建立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因素的模型,并且根据以上的分析确定了变量的符号:

$$V = f(I, S) \quad (1)$$

$$\frac{\partial V}{\partial I} < 0, \quad \frac{\partial V}{\partial S} < 0$$

式(1)中, V 表示货币流通速度, I 表示近代固定资本投资总额, 在这里代表中国近代经济的货币化程度, S 表示白银的流入与流出量。由于白银的流入流出数据是 1888~1935 年的数据, 近代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 1903~1936 年的数据, 所以我们的实证分析统一取 1903~1935 年的数据, 相关数据见附表。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实证分析之前要先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否则容易引起虚假回归。对 V 、 I 和 S 三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 2:

表 2 变量的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	(c,t,k)	D.W 值	ADF 值	1%临界值	5%临界值	结论
V	1	(n,n,1)	1.85	-5.05	-2.64	-1.95	I(1)*
I	1	(c,n,1)	2.01	-3.92	-3.67	-2.96	I(1)*
S	1	(n,n,1)	2.02	-2.06	-2.64	-1.95	I(1)**

**表示变量差分后的序列在 1%、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 ADF 检验

上述变量的 ADF 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理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被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等于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 两个解释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 可以进行协整检验。JJ 协整检验结果如表 3:

表 3 JJ 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临界值	λ -max 统计量	5%临界值	原假设
0.59	45.27	35.19	26.20	22.30	R=0
0.32	19.06	20.26	11.35	15.89	R=1
0.23	7.72	9.16	7.72	9.16	R=2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按照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 上述变量可以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

$$V = 8.7963 - 0.0031I - 0.0025S \quad (2)$$

(56.73) (-11.28) (-2.75)

$R^2=0.81$ DW=1.43 F=63.78 (0.0000)

经过对模型检验, 正态性 JB 统计量检验表明残差是正态的, 自相关的 LM 检验表明不

存在一阶和二阶自相关，ARCHLM 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和 White 异方差检验表明不存在异方差。以上检验表明，模型是可信的。

在该模型中，要弄清楚各个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可以使用 Beta 系数来衡量。按 Beta 系数公式计算得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重要性的结果如下：

$$\text{Beta (I)} = 0.95$$

$$\text{Beta (S)} = 0.23$$

如果将 Beta (S) 标准化为 1，则 Beta (I) 为 4.13。

根据两个解释变量的 Beta 系数，可以说近代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度是白银流量对货币流通速度影响度的 4 倍多，我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主要是由中国近代经济货币化程度的加深带来的。

三、简单结论

综上，影响我国近代货币流通速度降低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近代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即货币化程度的提高，这种经济的近代化的增长使得新增货币的很大一部分是满足原来并不需要货币的那一部分商品的需要。这种商品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是中国近代化增长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另一方面，这种商品化程度的加深，又由于列强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的掠夺导致的很高程度的被动储蓄减缓了；二是由于国内外白银比价变动导致的白银流入。白银持续流入，国内货币供应增加，货币流通速度减缓。

附表 1887-1936 年中国 Y、M1、V、I 及现银流动

年份	Y (亿元)	M1(亿元)	V	S(百万元)	I(百万元)
1887	124.58	6.78	18.37		
1888	126.52	7.16	17.67	-2.945	
1889	125.20	6.90	18.14	9.300	
1890	124.79	6.83	18.27	-5.425	
1891	125.89	7.15	17.61	-4.805	
1892	127.42	7.89	16.15	-7.440	
1893	130.71	9.62	13.59	16.740	
1894	134.80	10.75	12.54	40.765	
1895	134.87	11.19	12.05	56.885	
1896	138.75	12.40	11.19	2.635	
1897	139.13	13.07	10.64	2.480	
1898	139.71	13.59	10.28	7.440	
1899	146.48	15.09	9.71	2.015	
1900	138.60	14.13	9.81	23.870	
1901	145.45	14.88	9.77	-9.455	
1902	153.39	16.88	9.09	-21.390	
1903	152.52	17.45	8.74	-9.300	81
1904	154.47	17.71	8.72	-21.080	72
1905	157.94	18.62	8.48	-11.160	110
1906	160.06	18.22	8.78	-28.985	150
1907	160.24	18.77	8.54	-48.360	180

1908	159.38	18.51	8.61	-19.065	154
1909	162.33	19.06	8.52	10.540	178
1910	167.83	18.73	8.96	33.790	223
1911	167.74	19.03	8.81	59.365	166
1912	164.82	19.51	8.45	29.760	163
1913	178.09	19.77	9.01	55.800	207
1914	163.39	20.16	8.10	-21.080	267
1915	166.10	20.14	8.25	-28.520	183
1916	160.75	19.73	8.15	-44.485	243
1917	143.97	19.36	7.44	-32.550	210
1918	143.51	20.31	7.07	36.425	223
1919	180.88	22.04	8.21	82.305	442
1920	183.02	24.68	7.41	145.080	476
1921	191.31	25.71	7.44	50.220	560
1922	213.43	27.43	7.78	61.380	639
1923	211.45	29.13	7.26	104.160	486
1924	236.58	30.90	7.66	40.300	523
1925	226.87	33.65	6.74	96.875	514
1926	238.63	36.17	6.60	82.460	634
1927	248.58	37.65	6.60	100.905	590
1928	257.11	40.99	6.27	155.620	746
1929	266.26	45.61	5.84	163.990	893
1930	276.21	51.02	5.41	103.850	848
1931	285.70	50.12	5.70	70.370	843
1932	294.70	50.00	5.89	-114.000	865
1933	294.60	47.76	6.17	-141.000	1034
1934	269.00	41.85	6.43	-260.000	1271
1935	290.90	50.50	5.76	-295.000	1287
1936	309.40	66.08	4.68		1398

资料来源：(1) Y、M1 的数据取自刘巍《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对不同供求态势国家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218、219、221 页。(2) V 的数据根据表中的 Y、M1 的数计算而得。(3) S 表示现银流动，1888~1931 数据根据孔敏的《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白银的进出口量按 1 关平两=1.55 元换算为国币元，1932~1935 年的数据取自《海关报告册》，1935 年的数值加入了走私出口的估计量，负号表示流出。(4) I 表示国内近代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取自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46 页表 5.2。

参考文献：

- [1] 刘巍：《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对不同供求态势国家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2] 刘巍：《一种有害的货币供给机制：不可控外生性——对近代中国 1910~1935 年的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 [3] 罗斯基：《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4]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施瓦茨著，巴曙松、王劲松等译，《美国货币史 1867~1960》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5] Mishkin,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ial Markets,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Review of contemporary (1887~1936) China's money circulation velocity

Abstract: The paper attempts to calculate the income-velocity of money between 1887 and 1936 according to the equation of exchange and condu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factors. It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velocity of the money circulation during the specified period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increasing commercialization and the silver inflow and outflow generated by the fluctuating exchange rate of silver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 contemporary China, velocity of money circulation, monetize, silver flow

作者简介:

崔文生，男，1972 年出生，陕西临潼人，经济学硕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史。

联系电话：13672468810, 020-36517372

电子邮箱：jdjrgj2004@126.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 2 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510420

经济学可以从历史中获得什么：计量经济史学的贡献

Jean-Luc Demeulemeester Claude Diebolt

秦 庆 译 卢 阳 校

内容提要：计量经济史学是一门能够帮助经济学家缩短理论和实证分析之间差距的学科吗？对于许多学者来说，当然其中包括许多计量经济史学的倡导者，计量经济史学首先是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和技巧主要不是为经济学研究中有争论的部分而是为史学研究中的有争论部分提供解释。尽管如此，通过经济学家在经济学中发现真正的规律，这门学科能帮助经济学家更了解物理学吗？更准确地说，经济学家们最近所做的关于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表明，计量经济史学有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门辅助学科（不仅仅是历史学）。照此来说，计量经济史学应该成为所有获得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们所使用的基本工具中的一部分。本文论述了关于经济学规律的存在性（和典型性）这一主要的方法论问题，以及从更好的为经济学发展服务的角度出发，论述应该给予计量经济史学适当的地位。

关键词：经济规律 经济史 计量经济史学 方法论

一、引言

对于通过经济学方法所发现的经济规律和经济学的特性（推论或归纳，“软的”或“硬的”科学，等），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仅次于此，关于经济学应该效仿的学科：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或历史学，甚至哲学（Kolm 1986），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门学科应该是理论性的科学（能够提出普遍规律），但是关于这些规律的特性以及其与现实如何联系的问题很难达成一致（Lawson 1997,2003）。事实上，即使在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中，也达不到期待中的共识。的确有人认为经济学仅仅是数学的一个分支（Rosenberg 1992; Debreu 1991）。现实的经济情况如此之复杂，所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只有从以个人理性为原则的基础上推导出来的柏拉图式的理想方法才能被用来建立和经济变量有关的简单规律（Albert 1970）。根据一组非常精确的假设，这些规律是永恒的并且是有根据的（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如果派生出的预期合乎逻辑的话，后者会更不切合实际）。在经济学家当中，对于这种推导出规律的相关性实证研究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专家认为这些规律是纯逻辑性的，没有必要直接进行实证测量（在某种意义上，德布鲁维护这种立场；从事社会选择或经济判断的人们也赞同这种论点，目的在于规范科学）；另一部分认为这种派生出来的规律应该是可以验证的（隐含的变量应该有可以验证的、测量的副本，例如Beckerian的经济学）。这主要的差异是所谓的纯理论方法（Stigum 1990）还是现实主义方法（演绎方法应该告诉我们，即使这些将一直被隐藏，但是这些仍是可测量的或是可检验的），前者就是把经济学视为逻辑学、数学、甚至是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实证科学）那样；换句话

说,这种差异是把经济学看成“纯理论^①”的还是应用型的科学(即使像物理学,以一系列的数学理论为基础)。一旦环境被确定,通过使用测量、统计技术和推理(使用计量经济学的定量方面),理论经得起实证的检验。

这些经济学规律的永恒特性表明这些规律也是与历史无关的(即适应于经济发展的所有时期和阶段,并从属于所有的制度安排;(Hirshleifer 1985),同时表明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科学的普遍语法)。其他经济学家(例如 Marx 1867)也认为在经济学中存在规律,但只适应于一定的制度架构下(比方说资本主义)。对经济学家来说,对制度变化的研究也成为一个问题,他们应该是能解释此变化规律的推导者(总之:推动历史理论的发展,及从历史哲学发展到“历史科学”)。在对这些关于制度变化的规律进行测定时,对历史的研究将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演绎法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马克思使用了许多来自于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工具(1817)),但是一定程度的归纳法也是不可避免的(源于对过去一些经济学技巧的重要假设进行的观察,更主要是与社会或体制的发展有联系)。对一部分学者来说,他们比较重视历史分析法而轻视演绎法(在某一限度之内,在对克莱夫·格兰杰进行解释时,我们发现古典文学经济史就是“没有理论的观察或是一种非常不精确的”)。那两个德国历史学派在某些地方介于两者之间。德国历史学派不是完全没有理论基础,因为它寻找经济规律(与可观察到的演变息息相关,并通过仔细的历史分析能被发现),但后者主要是靠归纳法得出的(一般具有宏观经济学的特性;例如瓦格纳定理,是关于公共支出和经济发展联系的)(Hodgson 2001)。十九世纪末,随着在经济学中这股思维的消亡(除了德国持续了几十年外)以及新古典主义视角(尝试产生普遍性的规律,不受制度的影响)的出现,这种方法论结束了。传统的经济史学——除经济学领域以外——继续采用归纳工作和制度分析的方法,缺乏对理论的追求(尽管法国布罗代尔的历史中篇小说中不仅仅是描述一种现象,更是探寻现代经济体制是怎样诞生的)。二战后由于宏观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观点的盛行,一些经济学家在同样的“德国历史”哲学中探求类似作品,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使用更复杂的工具如描述通货膨胀和失业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1958),或是关于不平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库兹涅茨法则(1955),这些只是小部分例子而已。

二. 计量经济史学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1990,1994,2005)和罗伯特·福格尔(1994)似乎已经把这门学科神圣化为一种完全被接受的亚经济学领域。经济史学的现代化只要系统地运用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新),就能获得与企图经济学分支相同的地位。以前的数量经济史属于“应用的”部分(其很长一段时间不是最有声望的)。经济学确实一般被分为理论部分。如果计量经济史学仅仅是应用经济学的一部分,在已存在的争论中没有必要说太多(关于在经济学中规律的存在性的争论)。

在我们的学科中,理论比应用领域更受重视。年轻的博士生们经常需要建立高等数学的模型来展现他们的能力和精湛的技艺。数据的收集以及使用计量经济学技巧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并不受重视。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像理论分析那样需要一系列的创新(越来越多的计量经济学软件可以做这些繁琐的工作)。更深层的是,可能存在这样的事实,经济学家们根本“不按他们所说地做”。计量经济学家对理论进行研讨,这是相当罕见的。人们担心若彻底地应用波普尔方法论(每当我们仅仅找到一个样本或一段时期无效时,就会否定该理论),任何经济理论将不存在^②。无论如何,自卢卡斯批判(Lucas 1976)以后,经济学家非常怀疑计量

^① We should point out that some partisans of economics as a pure deductive theory do not advocate the use of mathematics but instead of logic, even a verbal ones (referring to a third type of reasoning between pure rethorics and pure mathematical logic. See the works of Perelman on legal logic)

^② One should note that the Popperian methodology may be more suitable for testing deterministic propositions

经济方法解决理论争论的能力。宏观模型没有明确的联系微观和宏观行为；他们确实假定固定系数，即，他们假定被动地代理，模仿工程模型处理技巧性的部分，并不能解释经济政策的改变为什么会带来行为上的变化。（经济行为主体不是被动的，能充分利用信息并预测未来）。我们也可以讨论其他问题，像总体偏差，数据质量以及计量测量的短期起点。理论家和“经验主义者”对不同的事情感兴趣，这一点也是存在争议的。20世纪90年代，许多理论工作是关于产业组织理论（委托代理模型，信息论，鼓励措施等）或内生增长理论的，然而，应用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主要对其他现象进行研究（汇率，金融等）。最重要的是，计量经济学似乎逐渐背离它的初衷——即检验经济理论将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更倾向于统计理论（Darnell and Evans 1990）。时间序列分析（因果关系，协整，VAR模型等）的成功可以帮助挖掘出数据中的规律（在时间序列中搜集）。在经济学中物物相容，一旦提及现实世界就很难区分外生变量，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成功的和前面这些基本思想相关。以结构建模为基础成功地发展了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之后，一些经济学家研究无理论测量方法（Darnell and Evans 1990）。这种方法的辩护者们认为，该方法更适合于解决现实世界（商业或政策）的问题。还应该补充说，一些应用经济学家的工作主要并不是检验经济理论和规律（这将涉及理论家和经验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事实上，数学家们认为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之间的分离就是人为造成的），而是更多地运用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工具来处理经济数据，无论是公共的（如通过大量的宏观经济模型的运用，宏观经济模型仍然是由经典理论和凯恩斯主义元素的混合组成的）还是私有的（所有的关于汇率和金融系列的计量经济学的工作，如下）。

很显然，从严格的实证角度来看，我们并不同于自然科学家们可以在可控的实验中获取高质量的数据，经济规律倾向于概率论而非决定论，在极端复杂的包罗万象的系统里这些关系是内在联系的（因此，物理学家，以及在我们认为经济学建模方法过于简单和陈旧的学者，他们立足于静态均衡观点，这种观点属于太过于牛顿化的物理学，如最近的例子 Beinhocker 2006）；经济中的参与者不像材料单位（原子）那样被动，而是具有智慧的生物，能够预测和分析信息（理性预期理论已经是对这些反对意见的一个回应，使大量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模型陷入解释的困境，即使这些模型仍然在现实中使用），这涉及到文化（理性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产生像制度或组织那样的结构——例如，诺斯（1990,1994, 2005）——反过来这种结构也能影响个体的行为）并有种历史性尺度（或是经济学家保罗·大卫提出的路径依赖问题——David 1997）。有趣的是，这些批判要么源于一种历史角度，要么首先来自接受过历史学训练的经济学家们（如卢卡斯），要么来自像诺斯（制度或文化）或大卫（研究 R&D 的专家）那样即是史学家又是经济学家。所有这些特征使我们开始认识到一种比凯恩斯理论假设更大的复杂性（效仿工程模型——如处于伦敦证交所地窖中的飞利浦液压机械）。面对这种逐渐被察觉到的复杂性，应用经济学家们倾向于抛弃计量经济学中的结构模型，而赞成“让数据自己说话”的观点（即使历史学家们从来也没有承认过事实可以述说它们自己的故事），这种方法更多的是建立在以时间序列的统计特性基础上的而不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技巧——也许这被视为在相关应用环境中不充分的或是太过于简单化（有可能出项在应用宏观经济学中）。尽管如此，我们需要指明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旨在检验微观经济理论的论点（不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且心理学家也会。）

一方面，如果某些经济学家对长期经济时间序列特性的分析能揭示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或能帮助决策者决策，其他经济学家也许会将研究更多地放在理论而不是实证上。这样的经济学家更加注重于逻辑分析，而不是计量检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许多经济学家赞

("always true") and that economics generally propose (empirically) probabilistic propositions ("true on average"). The new field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nevertheless consistently rejects the a priori purely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ssumptions-questioning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standard microeconomic analyses and calling for a much more complex modelling strategy

成这样的观点 (Debreu 1991)。他们认为经济学主要不是一门实证科学 (经济学家总结出的规律接近于数学理论或逻辑学家的结论, 而不是物理、化学或生物定理; (Kolm 1986) 甚至认为经济学仅仅是政治哲学的一个数学萌芽, 即, 一门规范而非实证的学科)。他们认为经济学应该通过既定的数理逻辑程序来集中推导某些命题。当他们不得不选择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时即一, 为赞同某些受质疑的观点或理论而煞费口舌, 笔墨; 二, 对这些观点, 理论漠不关心。经济学家 (像 Wittgenstein) 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类似于统计学中第一和第二类风险), 当真理和精确度发生矛盾时, 他们往往选择后者 (Mayer 1993)。按着这条思路, 经济学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合乎逻辑的、先验的非实证的科学, 其主要在于因理性原理产生的所有可能结果的分析 (在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约束下)。以同样的方式, 几何学家提出一系列的公理 (两点之间有且仅有一条直线, 两条平行的直线永远不可能相交等, 来限制欧几里德几何方法), 然后用数学逻辑去推导所有可能的结果, 经济学家们也应该这样做。这种不证自明的程序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受到提倡, 而是越来越受到重视, Stigum 1990) 大胆认为在长期内这种非实证的方法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工具, 能渐渐地引导我们对经济现象有个更加基本的了解。从柏拉图式的眼光来看, 向数学方法的转变会让我们经济研究工作特别是比较抽象晦涩的理论注入新的活力。(但不是工程师的, 而是作为正统凯恩斯经济学) 在这实证论的作用是次要的 (充其量), 肯定是要打折扣的。由纯理论构成的世界 (例如, 完全竞争) 通常只是现实世界的一个梗概, 一个可以进行 “思想实验” 的理想化的地方 (理想实验, 或按法国人的话说)。但人们必须提到的是, 在这种理论下提出一些概念根本没有相匹配的方法去实证检验。博弈论可以被视为这种抽象活动中的一个典型 (即使现在越来越多的实验经济学家试图检验其理论, 或至少在一些关键定理上)。即使有人不赞同经济学是传统学科的观点, 决定使用这些工具 (例如来自博弈论和产业经济学) 来解释观察到的规律或只是观察到的现象——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通常发生, 它将面临许多的平衡情况或各种可能的模式。最后, 这些模型似乎是通过其他的方法解释经济活动, 而不是明确的变量和系数。然后理论倾向于变成一系列小范围的、有点特别的模型。即使正统的经济学似乎也难逃其他社会科学的命运 (演绎将战胜推理)。

三、在经济学中计量经济史学有怎样的作用?

再回过头来说计量经济史学, 它是一门能够帮助经济学家缩短理论和实证分析之间差距的学科吗?

对于许多学者以及它的倡导者们来说, 计量经济史学首先是历史的一个分支, 它使用经济学的工具、技巧和理论来解决历史学的争论, 而不是经济学争论。然而, 这门新学科能使经济学家像物理学家那样在试验中发现规律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 对 (美国的) 经济史学家来说, “经验主义” 的含义已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人们能够观察到一种变化, 虽然从能被 “古典历史学家” (对其来说, 从文献集中获得的任何东西都能被用在他的论证中, 起初一点也不可能, 但现在还能被用在数据资料以及图表中) 到 (应用) 经济学家 (实证方面包含对时间序列的分析), 前者提出了实证事实的概念。正是对建立发展理论有共同兴趣, 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理论观点聚集到了一起。在有可能识别出某部分是经济发展中心之前, 一开始, 即在过去的经济史中, 强调完成一个对主要的宏观变化的数量经济分析, 库茨涅茨似乎在强调这一点上起着关键作用。人们应该注意到, 即使在他所关注的将历史和经济分析结合起来, 他提出的发展理论是基于对过去社会变迁细致的归纳而这样的归纳建立在经济史学家长期积累得出的时间序列基础上的。尽管有更多精细的技术可以使用, 在经济学中 (已经提到过的德国历史学派, Schmoller 1904; Hodgson 2001), 这种 (归纳的) 观点和历史潮流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这两门学科越来越

接近,但可能只限于在“归纳的”经济学框架内。重要的是,尽管早期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以历史(也就是归纳的)为依据的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史学主要试图解决一些史料性的问题(例如,在美国经济史中铁路的重要性或奴隶制度的经济效益)——因此,和历史学家交谈的要比和正统的经济学家交谈的多。随着时间序列的重构,及通过插值法或外推法对缺失的数据进行补充,计量经济学方法被广泛地运用(这正是使专业的历史学家恼怒的东西),但这些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有历史学的遗传,有助于解决史学的问题(认为经济学理论或计量经济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当计量经济史学的方法被聚集起来建立一种发展理论的时候(这种理论是在可被测定的事实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发展了一门逐渐符合德国历史学派目标的经济学,而不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和理论性较强的新古典经济学。例如,关于在经济发展中的阶段,库茨涅茨和罗斯托之间的主要矛盾其实是建立在于罗斯托理论的经验基础之上,根本不是关于归纳和集合观点孰优孰劣的争辩,这种观点缺少严谨的宏观(不适用于增长理论)或微观基础,这一点无疑成为当今批判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总之,计量经济史学仍是(经济学)历史的一个分支——同样地,随着在考古学中方法的现代化,从碳14测量到统计技术的使用(如判别分析),也没有使考古学转变成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还是说通过计量经济史学的方法来获得理论结果,这种结果主要根据从收集到的时间序列中得到归纳,而不是来自推断的模拟实验,即,要建立一个经济学理论,必须首先有事实和一种公认的实证结果作为基础。通过这种方式,有助于一门经济科学成为与德国历史学派而不是新古典学派有更紧密的联系。

到此,争论还没有结束。最近经济学家(严格意义上讲)所完成的一些关于计量经济史学的研究表明,计量经济史学也可能是经济学本身的一门辅助学科。就其本身而言,它应该成为所有经济学家拥有的工具和技能的一部分。然而,就像辅助学科所表明的,如果它有一点(不是太多)超出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围,那么经济学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由于旧制度文化和现实都带有旧经济史学的特点,它必须是最新计量经济学技术和经济学理论应用的一个合成。然而,历史学通常是一门合成的学科。计量经济史学也该是这种情况。若非如此,如果计量经济史学被剥夺它所有的“历史层面”,它将很容易消亡(它将只是应用于过去的经济学,或只是可追溯的计量经济学练习)。为了对经济学专业有总体帮助,它主要的工作应该是收集所有从历史中搜集到的相关信息来丰富或甚至挑战经济学原理(或理论)。并且这种相关信息也应该包括文化的或制度的发展,假如他们能作为对经济学专业有用的而且能通过适当的方法呈现出来。在经济学家(其实,开尔文也是)当中有一种传统观念,即“先定性后定量”。但是难道就不可能“先定量后定性”有时也是正确的吗?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所谓的历史性批判的意识,以及对消除纪年错误的渴望。除了对史料做进一步考察,也包括对制度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做进一步的考察,这些能构成约束参与者行为的框架。(新)经济史学的确不会创建一个一般化的理论——在他们的环境下分享考察经济现象的必要性的信念太过强烈——但它能启发一些有用的观点及洞察力,基于可靠的调查以及合理的事实评估,经济学家们正尝试发展经济行为规律(不像历史学,经济学仍是一门规律科学)。经济学家和计量经济史学家也能合作进行共同的研究。阿科姆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共同赞同的观点(2004),试图使用来自传统史料来建立对经济理论经济学家有用的新观点。

总之,运用计量经济史学的方法不是一项简单的练习。在变的局限于“经济学的”时候,计量经济史学将不可能回答某些问题,例如,在进行研究的时期(只能评估现象而不能进行解释),回答这些问题将需要更多的关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的信息,或关于证券交易所的实际运作的信息。在一定的条件下(确定的地点和时期),要想描述缺乏这种经济理论相关性(或明白不足)的原因,需要历史学的方法和额外的信息。也许仅在这一点上,计量经济史学能为经济学家们提供些东西。然而,当变得太过于“历史的”时候,计量经济史学将不再

呼吁经济学界人士。经济学家需要新的经济史学家了解他们的争论和兴趣。

最后但重要的是,总有一天(也许发展比较缓慢),计量经济史学不仅是经济学的一门辅助工具,而应贯穿所有经济理论。的确有最后一种可能,把新经济史看作体制和组织结构出现的科学(Greif 2006: North 1990, 1994, 2005)。为了揭示关于各种制度安排的效率的程式化事实,以及制度变化的因果问题,经济史学将运用本学科的方法以及结合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各种方法。这将有助于理论家发展一个关于制度变迁的可靠理论,即,同时也是普遍的(例如满足现在决策者的需求),当严格基于经验规律性(由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联合分析提出的)上时理论上是可靠的(基于理论原则)。对制度形态^①进行的分析将是计量经济史学真正的理论部分,这将把它自己从表面上是纯粹经验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作为计量经济学家长期研究的领域。

显然,经济学家们对普遍性的渴望以及对数学的迷恋并没有激励他们过于关心实际情况。然而,像诺斯(1990,1994,2005)或格雷夫(2006)这样的新制度经济学家警告我们要认真考虑制度背景(包括文化上的)。因此,本文也旨在鼓励经济学家更加系统地基于史实检验经济理论,同时旨在确立关于产生体制或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除了对长期数据集进行研究,计量经济史学也越来越多的关注制度的作用和演变,目的是将经济学家对普遍性的渴望以及对特定制度环境的关注结合起来,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下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历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特点。经验主义以及抽象理论的结合也许能打开通向更完善的经济理论的大门,使经济学家能更深入地理解经济和社会的运行,另外能提出更好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 Acemoglu D, Johnson S, Robinson J (2004) Institutions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long-run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s No. 10481
- Albert H (1970) Modell-Platonismus. Der neoklassische Stil des ökonomischen Denkens in kritischer Beleuchtung. In: Topilsch E (ed)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pp 406–424
- Beinhocker E (2006) The origin of wealth. Evolution, complexity and the radical remaking of economics. Random House Business Books, London
- Darnell AC, Evans JL, (1990) The limits of econometrics. Edward Elgar, Aldershot
- David P (1997) Path dependence and the quest for historical economics: one more chorus of Ballad of QWERTY, University of Oxford discussion paper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 Debreu G (1991) The mathematis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Am Econ Rev 81:1-7
- Fogel R (1994)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heory, and physiology: the bearing of long-term processes o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m Econ Rev 84:369-395
- Friedman M (1953)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Greif A (2006) Institutions and the path to the modern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in press)
- Hirshleifer J (1985) The expanding domain of economics. Am Econ Rev 75:53-68
- Hodgson G (2001)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Routledge, London
- Kolm SC (1986) Philosophie de l'economie. Seuil, Paris
-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 Econ Rev 65:1-28
- Lawson T (1997) Economics and reality. Routledge, London

^① To use the term of the French mathematician René Thom.

- Lawson T (2003) Reorienting economics. Routledge, London
- Lucas R (1976)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pp 19–46
- Marx K (1867) Das Kapital, Marx-Engels Werke. Dietz, Berlin (1964)
- Mayer T (1993) Truth versus precision in economics. Edward Elgar, Aldershot
-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 North D (1994)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Am Econ Rev 84:359-368
- North D (2005) Le processus du développement économique. Les Editions d'Organisation, Paris
- Popper K (1973) La logique de la découverte scientifique. Paris, Payot (1935)
- Ricardo D (1817)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In: Sraffa P, Dobb M (eds)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51)
- Rosenberg A (1992) Economics: mathematical politics, or the science of diminishing retur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 Schmoller G (1904) Über einige Grundfragen der Sozialpolitik und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 Duncker & Humblot, Leipzig
- Schumpeter J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 Stigum BP (1990) Towards a formal science of economics. MIT, Cambridge

How much could economics gain from history: the contribution of cliometrics

Jean-Luc Demeulemeester·Claude Diebolt

Abstract : Is cliometrics a discipline that could help economists to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For many authors, and certainly many of its protagonists, cliometrics appears to be first of all a new branch of history, using economic theories, tools and techniques to provide answers mainly to historiographical debates and not so much to economic debates per se. Could nevertheless this discipline help economists to come closer to physics by enabling them to discover true laws in economics? More modestly some recent work in cliometrics performed by economists (stricto sensu)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of cliometrics to be an auxiliary discipline of economics (and not solely of history). As such, it should form part of the basic toolkit of all properly educated economists. In this paper we give a survey on the key methodological issue of existence (and type) of laws in economics and the proper role that could be assigned to cliometrics to best serv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in this perspective.

Keywords: Economic law Economic history Cliometrics Methodology

作者简介:

Jean-Luc Demeulemeester: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UK 英国牛津大学
e-mail: jldemeul@ulb.ac.be

Claude Diebolt: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Berlin, Germany 柏林洪堡大学

e-mail: cdiebolt@cournot.u-strasbg.fr

译者简介:

秦庆: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e-mail: qinqing88@126.com